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参考

MAOZEDONG SIXIANG HE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TIXI GAILUN
GUANCHE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GUAN JIAOXUE CANKAO

潘金刚 彭祥睿 杨帆 编

非
外
借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本书为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2014SZKMS-JGZS0017)与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建设项目成果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参考

MAOZEDONG SIXIANG HE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TIXI GAILUN
GUANCHE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GUAN JIAOXUE CANKAO

潘金刚 彭祥睿 杨帆 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参考/潘金刚,彭祥睿,杨帆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650-2773-4

I. ①毛… II. ①潘…②彭…③杨… III. ①毛泽东思想—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A84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592 号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参考

潘金刚 彭祥睿 杨帆 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张慧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41 千字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773-4

定价: 32.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它对教学体系的建构、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案例的选择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贯彻中央相关精神要求，我们特意编写了这本教学参考用书，旨在探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教学。为了更好地推进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我们依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结合近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将教材原有的章节体系转换为九个教学专题，梳理出相关专题课程教学中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点，提出若干贯彻建议，对涉及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作出学术解读，对开展实践教学贯彻核心价值观作出一些建议。此外，还提供若干阅读材料、典型案例、阅读书目，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作为一种探索，这本书还是不成熟的，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本书为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弘扬核心价值观名师工作室”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2014SZKMSGZS0017）与安徽大学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心建设项目成果。

编 者

目 录

专题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	(001)
一、贯彻要点	(001)
二、贯彻建议	(002)
三、学术解读	(003)
四、延伸阅读	(010)
五、典型案例	(028)
六、实践教学	(031)
七、参考书目	(031)
专题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与初步探索	(033)
一、贯彻要点	(033)
二、贯彻建议	(034)
三、学术解读	(035)
四、延伸阅读	(053)
五、典型案例	(061)
六、实践教学	(065)
七、参考书目	(065)
专题三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本质	(067)
一、贯彻要点	(067)
二、贯彻建议	(068)

三、学术解读	(069)
四、延伸阅读	(078)
五、典型案例	(090)
六、实践教学	(091)
七、参考书目	(092)
专题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093)
一、贯彻要点	(093)
二、贯彻建议	(094)
三、学术解读	(094)
四、延伸阅读	(105)
五、典型案例	(114)
六、实践教学	(120)
七、参考书目	(120)
专题五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	(121)
一、贯彻要点	(121)
二、贯彻建议	(124)
三、学术解读	(124)
四、延伸阅读	(133)
五、典型案例	(142)
六、实践教学	(146)
七、参考书目	(146)
专题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147)
一、贯彻要点	(147)
二、贯彻建议	(149)
三、学术解读	(149)
四、延伸阅读	(154)
五、典型案例	(166)
六、实践教学	(169)

七、参考书目	(169)
专题七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70)
一、贯彻要点	(170)
二、贯彻建议	(171)
三、学术解读	(171)
四、延伸阅读	(175)
五、典型案例	(187)
六、实践教学	(190)
七、参考书目	(190)
专题八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191)
一、贯彻要点	(191)
二、贯彻建议	(192)
三、学术解读	(192)
四、延伸阅读	(198)
五、典型案例	(211)
六、实践教学	(221)
七、参考书目	(221)
专题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222)
一、贯彻要点	(222)
二、贯彻建议	(223)
三、学术解读	(224)
四、延伸阅读	(226)
五、典型案例	(239)
六、实践教学	(243)
七、参考书目	(243)

专题一 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贯彻要点

1. 近代中国革命与追求国家富强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首要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2. 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需要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为了挽救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多次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近代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贯彻建议

1. 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和纲领，讲清楚以下问题

(1)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首要因素，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前提。

(2) 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政治上消灭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3) 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4)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现代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保护并不是无条件的。需要保护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

2. 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政权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反封建的人们在内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已被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采取的国家政权形式（国体）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这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最直接、最全面地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和准则。

三、学术解读

1. 革命与革命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革命”（revolution），始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据雷蒙·威廉斯考察，“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使得 revolution 一词的现代意味愈发突出。revolution 过去“恢复法定的执政当局”之意涵逐步消退，并被“必要的革新”、“建立新秩序”的新意涵所取代，而带有正面的进步之意。在 revolution 的词义中，“创建新秩序”与“颠覆旧秩序”同样重要，这使得 revolution（革命）与 rebellion（叛乱）以及 palace revolution（宫廷革命）区别开来。同时，在对历史上发生过的武装叛乱或冲突的政治论争中，revolution 一词带有“暴力推翻”之意，在 19 世纪末它被拿来与 evolution 对比，并与后者“经宪政上的和平改革而产生新社会秩序”的意涵得以明确区分。革命的意涵正是在上述历史的发展中得以澄清，并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界定。斯考切波如是描述革命：在世界现代史上，社会革命是一些极少发生却又意义重大的事件。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

革命现象虽久已有之，但对革命问题的系统研究，则是 20 世纪以来才逐步在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依据学者的归纳，持续于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的“自然史学派”的革命研究可视为第一代的革命研究。这一时期的革命研究主要通过个案致力于对革命过程进行细致的描述，总结革命进程各阶段的特征，试图归纳出各种革命模式。主要代表作有勒庞的《革命

心理学》、索罗金的《革命社会学》和佩蒂的《革命的过程》等。

第二代的革命研究，持续时间大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革命研究，在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主要致力于解释各种革命发生的原因，并试图提出某种关于革命规律的“普适性理论”。主要代表作有格尔的《人们为什么造反》、詹森的《革命性变迁》、斯梅尔塞的《集合行为理论》和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等。

第三代的革命研究，以结构性视角为主要途径，通过比较分析少量重大革命事件，试图在找出革命的发生原因的同时，将革命的进程和革命的后果统一纳入研究框架之中。这一路径的研究，大约持续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伊朗革命这一时段，主要代表作包括艾森斯塔特的《革命与社会转型：对文明的比较研究》、佩基的《农村革命：不发达世界的社会运动与农业出口》、崔伯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日本、土耳其、埃及和秘鲁的军事官僚与发展》和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分析》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第四代革命研究，带有与《国家与社会革命》对话的性质，其关注的对象仍然是革命发生的原因，但他们试图超越第三代研究者们过分强调结构性条件和某些结构性因素的限制，试图将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内在构成和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第四代革命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阿米尔的《为国王所包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詹姆斯的《革命与革命性运动》、高尔德斯通的《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反叛》和高德温的《中美洲的革命性运动：比较分析》等。

综观学术界关于革命的研究，一个突出的关注点是革命发生的原因。关于革命发生的原因，理论解释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对应于劳动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揭示了整个社会最隐蔽的秘密和整个社会最隐蔽的基础，由此就产生了支配与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与此相应的特定的国家形式。”因而，革命的根源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基本矛盾中寻找。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

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新的生产关系诞生于现存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中,革命通过孕育于旧式生产关系中的新生革命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冲突而将一种生产方式改造为另一种生产方式,成为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二是聚合-心理学理论。这一类理论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与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如在《人们为什么造反》一书中,托德·格尔试图建立起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普遍性理论,以解释各种大规模的“政治暴力”。格尔认为,当人们觉得有资格获得有价值的事物和机会,而现存的事物和机会与之存在着差距时,即相对剥夺感出现,人们就会变得义愤填膺。当一个社会中出现了广泛、强烈和多方面的相对剥夺,而且这种相对剥夺既触动了大众,也触动了有抱负的精英时,他们就会广泛地参与并被组织起来,此时就有可能产生政治暴力。

三是政治-冲突理论。这类理论认为,在解释集体暴力和革命时,应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这一理论路径是在同前述从受挫-攻击途径解释革命的争论中产生的。政治-冲突理论家们认为,革命和集体暴力群众的紧张和不满情绪扩散的表现,无论人们的不满聚集到何种程度,除非他们能够最低限度地成为有组织集团的一个部分并获得某种资源,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参与政治行动。即使在这种时候,政府或竞争性集团有可能通过提高他们的行动成本,而成功地压制他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志。查尔斯·蒂利的《从动员到革命》是政治-冲突理论的重要代表作。在蒂利看来,革命是一种集体行动,即人们为追求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行动。革命过程中,斗争双方或多方都为了获得对民众的根本政治统治权而战斗,而且挑战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取代了现存的掌权者。因而,革命的发生,首先是“多元主权”(multiple sovereignty)局面的出现。“当先前默默忍受的社会成员……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即政府的要求与另一个声称要控制政府的实体的要求……而且他们顺从了另一个实体的要求时,革命运动就会来临。他们为另一个实体提供税收、为其军队供给人员、供养他们的官员、对其符号致敬、投入精力为其服务并提供其他资

源，尽管这些行为是他们先前曾经顺从的政府所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主权时代就开始了。”当然，成功的革命不仅取决于多元主权局面的出现，还有可能取决于政权内部的成员和提出独占政府控制权要求的竞争者之间结成的联盟。同时，还必须要取决于革命联盟能够控制充分的武力。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革命挑战者才有可能击败并取代原来的掌权集团。

四是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这类理论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这一理论的代表作是卡尔梅森·詹森（Chalmers Johnson）的《革命性变迁》一书。詹森通过借用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从社会整合与变迁的角度，分析了革命的发生。在詹森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中，价值取向和政治合法性是解释革命情势出现、当局的选择、革命力量的性质和成功的关键因素。詹森提出，一个正常的、没有危机的社会可被看成“价值协调的社会系统”，在功能上能够适应环境变迁中的紧急事件。这种社会系统由一系列制度构成，这些制度用规范和角色来表达和执行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也通过社会化过程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成为大多数正常的成年社会成员认识现实的标准。如果从外部或内部出现了新的价值或技术，从而出现了价值与环境之间严重不协调时，即社会结构跟不上环境变化，原有的价值取向失去权威时，社会中的人们就会变得无所适从，并由此可能转向由革命运动提倡替代性价值取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当局又不能富于技巧地通过改革实现环境和价值的重新协调，从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强制性力量来维持秩序。革命就会用暴力颠覆当局的顽固与不肯妥协，实现社会系统的变迁。

五是结构性视角理论。这一理论模式的代表作是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在斯考切波看来，前述四种视角关于革命的研究虽有不同，但都描绘出了一致的革命总体图景。“在这一共同的画面中：首先，社会系统或社会的变化产生出了怨愤、社会性方向迷失、新阶级或集团利益以及追求集体动员的潜能。然后，由此而建立起了一种有意识的、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运动——结合了意识形态和组织的力量——有意识地进行推翻现存政府甚至有可能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活动。最后，革命以冲突的形式解决与当局支配阶级的矛盾。而且，革命运动如果取胜，就会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并实施自己的纲领。”斯考切波认为，在这种考察理路中，大约都

将普遍的革命进程视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者是由有意识的目标所引导的运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即使在理论家们有意识地将社会-结构分析转化为社会-心理解释时,也仍然会将革命的发展看成为一种劝诱过程”。这一目的论图景强烈地暗示“从最初发动革命的核心群体的活动、意图或利益的角度来解释革命的进程和结果”。斯考切波认为,为了解释社会革命,必须要找到问题点,首先要弄清楚旧制度下革命形势的出现原因。然后,要确定受制于客观条件的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这“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研究”。结构性视角意味着要集中关注各种关系存在中的既定国家本身。斯考切波认为,国家具有两幅面孔,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其二是国家的国际体系。因而考查革命中国家组织的崩溃和建立,不能只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还必须关注国际条件和压力与阶级结构之中经济和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叉点。“这里才是一个寻找导致社会革命的政治矛盾的观察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发现在社会革命危机中塑造着国家组织重建的力量的地方。”

2. 革命与现代化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如何使中国近代化。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息息相关,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是为中国在整体上实现现代化创造政治的、经济的前提,从而使中国现代化真正成为可能。这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前提,必然是以革命手段,首先取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政治的变革。诚如毛泽东指出的:“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

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

革命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这一概括应该说得到了近代中国历史事实的反复证明，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革命并将革命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的有力回击。但过于模式化的革命史叙事，对革命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的同时，却容易忽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与反帝反封建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关注不够，使人们难以更细致地看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此外，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会忽视生产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以阶级分析法作为唯一方法来分析近代历史的复杂现象，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这也正是主流现代化研究对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提出的问题。

面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论争，有学者尝试从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上寻求二者的可沟通之处。如张静如在《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革命的干预，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又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于是就在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之间，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桥梁，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只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要解放生产力，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对于这种关系，人们常常称之为前提关系，即把社会革命看作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或先决条件。这样说，不能说不，但不够准确。我以为，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包含关系更为恰当、贴切，这就是前边所说的社会革命包含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之中。这种说法，可以给人以一体化的认识，有利于揭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大过程，而不是两个过程的相加，这就在认识上避免了产生把社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对立起来的误解。”这一观点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观点有对话性。亨廷顿认为：“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这样做……因此，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达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可能发生在高度现

代化的社会里……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里，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进程又已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

循此理路，或许能够在尊重近代中国革命事实的基础上，有助于发掘出原来受到忽视的中国近代一步步艰难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深化中国近代政治史、近代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相关研究参见张静如：《论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5期；左玉河：《革命与现代化——正确看待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第693期；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评价

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造。这一理论明确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中国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系统阐明了中国新式民主革命的时代特点、基本性质、领导力量、发展阶段与革命前途等重要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最能显示它的特点——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书本上没有的，但又的确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个方面是农民问题。这就是在农村党领导组织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战争和革命中提高农民水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全国胜利。另一个方面是资本主义问题。和“左”倾机会主义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不同，毛泽东的理论是要区别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对前者要采取慎重的政策，不是一概打倒、一律反对。正是依靠包含上述两个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才可能有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这样广大的统一战线，也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理论不仅仅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探讨，在当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